

全球智库半月谈

脱欧的关键：特蕾莎·梅的最后一战

中期选举结果及其对贸易的影响

欧佩克的困境

美国退出 WTO 对美国关税有什么影响？

新兴市场的风险黑天鹅

中国需警惕一带一路建设的开销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李芳菲

史明睿

申劭婧

伊林甸甸

杨茜

张寒堤

张舜栋

张子萱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张寒堤 邮箱:iwepceem@163.com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脱欧的关键：特蕾莎·梅的最后一战..... 6

脱欧已经进行了两年，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撤出协定》已经基本完成，双方的贸易互惠政策是否保留成为了最后的障碍，双方决定暂且维持现状，在 2020 年底之前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贸易协定的谈判期能否无限期延长又成为了新的争议点。特蕾莎·梅希望在年底前让（英国）议会下议院同意《撤出协定》，若该协议没有通过内阁和下议院，特蕾莎·梅很可能会被迫下台。

中期选举结果及其对贸易的影响..... 9

美国于上周进行了中期选举。与民调机构长期以来的观点相同，贸易政策问题一直不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主要议题。从贸易角度来看，除个别情况外，中期选举结果符合传统。选民大多是根据其他问题进行投票。

欧佩克的困境 11

近几个月来，国际能源市场遭遇了重大波动，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超过 20%。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欧佩克组织将做出怎样的反应？笔者综合各方因素给出了分析。

欧洲央行正处于重大政策错误的边缘..... 13

尽管欧元区三季度 GDP 增速创四年多新低，但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依旧对欧元区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乐观。

美国退出 WTO 对美国关税有什么影响？.....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 2017 年以来曾多次表示希望美国能够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并在今年七月份下达命令起草了《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废除最惠国条款，要求在进口关税方面平等对待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的关税究竟有何影响？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总统是否有权利将美国拉出世界贸易组织并下令征收更高的关税？

新兴市场的风险黑天鹅..... 24

在面对众多的国内外风险时，新兴市场往往更容易受到影响。我们根据这些风险的可预测性与安全性，对其进行分类，并以此开发了一个框架。随着预期外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

风险担保的难度也会不断提高。但如果出现不可预测且影响重大的极端情况(如“黑天鹅”),各国只能依靠经济体强大的复苏力,或寻求来自外部的援助。

中期选举的影响..... 31

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民主党重新执掌众议院,而中期选举也可能会对未来美国国际、经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由四位专家的讨论组成。

美国中期选举和全球经济..... 34

美国民主党最近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同时共和党在几十年来最重要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参议院。本文总结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对该新闻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聚焦中国

中国的再平衡 37

对于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而言,再平衡问题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笔者从四个角度观察并总结了中国 2017 年在再平衡问题上取得的成绩及遭受的挑战,笔者认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再平衡的步伐在 2017 年显著放缓,但这并不会逆转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进程。

中国需警惕一带一路建设的开销..... 42

最近半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数量迅猛增长,从先前的 75 个增至如今的 117 个。尽管如此,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和建设规模并没有进一步加速的迹象。作者提出,由于一带一路主要吸引的是国有企业,且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使用外汇储备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因此一带一路的投资前景值得进一步观察。

本期智库介绍 47

脱欧的关键：特蕾莎·梅的最后一战

Heather A. Conley/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脱欧已经进行了两年，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撤出协定》已经基本完成，双方的贸易互惠政策是否保留成为了最后的障碍，双方决定暂且维持现状，在 2020 年底之前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贸易协定的谈判期能否无限期延长又成为了新的争议点。特蕾莎·梅希望在年底前让（英国）议会下议院同意《撤出协定》，若该协议没有通过内阁和下议院，特蕾莎·梅很可能会被迫下台。编译如下：

经过两年的定位、吹风和政治活动，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所谓的最后一战即将到来。英国和欧盟刚刚宣布已达成一项临时撤出协定。谈判材料(所有 500 页的文本)将摆在台面上，首先由 5 月份时组成的内阁批准（不批准就辞职），随后送议会下议院投票。

自去年 7 月以来，英国退欧的状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内阁辞职人数不断增加。英国和欧盟已经制定完成了《撤出协定》的“95%”和随附的政治宣言。然而，最后的 5%成为了主要的障碍：终止爱尔兰后备计划，还是“为后备计划准备后备方案”。

回顾一下事件进程。英国和欧盟均同意在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不应该存在“硬边界”，但双方在确切含义上存在分歧。欧盟的解释是，北爱尔兰必须保持与欧盟的海关安排，并保持紧密的监管一致性（实质上就是让北爱尔兰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内，以避免边境检查）。对英国而言，共识意味着英国的部分地区（北爱尔兰）不能与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因此，英国面临的海关和监管协定的约束必须与北爱尔兰相同，直到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商生效。

过渡期将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但是，如果过渡期结束，自由贸易协定没有谈判成功，会发生什么呢？

欧盟认为，谈判没有时间期限，因为不可能存在“硬边界”，英国不能单方面退出关税同盟。然而，英国即将寻求与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英国不希望永远被关税同盟所束缚，并坚持过渡期必须有期限。一项折衷的办法是让英国与欧盟建立联合仲裁机制，双方中止现有的贸易互惠政策。但这种做法有点像是让英国第二次申请脱欧。换句话说，本次脱欧是让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只是在名义上脱欧，支付更多的资金（例如，脱欧账单），对欧盟未来的贸易规则丧失发言权，除这些之外的部分英国依然属于欧盟。这就是政治道路变得如此复杂的原因。

特里萨·梅(Theresa May)正试图利用时间表为自己谋利。她寻求在本周内与欧盟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该协议能在 11 月 25 日的欧盟理事会会议上得到正式批

准。这确保了下议院可以在年底前投票。她还试图保证除了她提供的协议和“不达成协议”的灾难(感觉起来就像公投前的“恐惧计划”运动,但政府提供了更多细节)之外,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例如进行二次公投)。没有协议就意味着没有过渡,这意味着英国将于2019年3月30日脱离欧盟。

内阁将于明天下午(11月14日)召开会议,部长们将决定要么支持首相,要么辞职。英国脱欧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和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等人将辞职,以真正撼动特里萨·梅(Theresa May)的地位。在过去的两周里,特蕾莎·梅一直在积极努力,试图在提交最终协议之前消除党内的异议。她的内阁不喜欢已经谈妥的协议,一些部长可能会辞职,但是目前看来,内阁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但这并不是特蕾莎·梅最担心的问题。

所有迹象都表明梅在下议院没有足够的票数。特里萨·梅(Theresa May)需要与给予她“信心和支持”的伙伴——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保持良好关系,并争取该党在下议院的10票支持她,努力争取工党(Labour Party)成员支持这项协议,并将保守党的倒戈人数降至最低。

如果该协议未能获得通过,梅可能会利用市场影响对政治施压,并尝试再次投票。她还可以利用投票的失败作为对欧盟做出更大让步和提供修改协议的筹码,即辩称要不是这次失败,她本能为英国争取到更好的协议。如果她继续担任首相,并且协议失败,那么英国的政治焦点会转移到工党身上。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会怎么做呢?科尔宾认为工党不应该支持特蕾莎·梅的提议。很明显,他把争取提前选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但提前选举必须获得下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依据固定任期的议会法律),这就要求保守党也支持提前选举。由此观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科尔宾上台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寻求第二次公投(特里萨·梅此前一直极力避免的选择)。迄今为止,他一直表示不会支持第二次公投,但他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大。

举行第二次公投的时机也存在问题。时间正逐步接近2019年3月29日。目前,欧洲法院正在审理一个案件,以决定英国是否可以单方面撤销其《里斯本条约》第50条中的提前告知要求(该条款为欧盟设定了两年的脱欧通知时间),以及欧盟是否必须同意脱欧。裁决将于11月公布。

“分手”确实很难。

本文原题为“Bracing for Brexit: Theresa May’s Endgame”。本文作者 Heather A. Conley 为 CSIS 负责欧洲、欧亚大陆和北极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欧洲项目主任。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 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期选举结果及其对贸易的影响

William Alan Reinsch / 文 杨茜 / 编译

导读：美国于上周进行了中期选举。与民调机构长期以来的观点相同，贸易政策问题一直不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主要议题。从贸易角度来看，除个别情况外，中期选举结果符合传统。选民大多是根据其他问题进行投票。编译如下：

美国于上周进行了中期选举。它对贸易政策有何影响？这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选民们对总统的贸易政策有何看法，以及明年 1 月的新国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第一个问题，选民们的答案并不是很多，这证实了民调机构长期以来的观点，贸易通常是一个低强度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问选民，他们对贸易和贸易协议有何意见，他们会有自己的看法。但如果你问他们，“我们国家面临的三大问题是什么？”贸易往往排在第 7 或者第 8 位（遗憾的是，只比气候变化问题排名靠前）。长期以来，贸易政策问题一直不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主要议题，尽管它是美国特定部门的决定性因素。

今年出现了两个趋势。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把反对总统的贸易政策作为她竞选活动的关键，但是她输了。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也是如此。密苏里州和北达科他州的农民显然还没有对总统失去信心，或者认为其他问题更重要。同样，明尼苏达州东北部的一名共和党候选人获得了胜利。这是由于明尼苏达州北部为铁矿地带，特朗普对钢铁加征关税的政策在此地区很受欢迎。众议员迈克·博斯特之所以保住了他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席位，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包括花岗岩城，在总统征收关税后，这里的一家钢铁厂重新开业。当然，也存在民主党参议员布朗谢罗德·布朗在俄亥俄州再次当选的现象。

另一方面，在爱荷华州（受到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报复性关税影响最深的农民聚集地）的两个国会席位进入了民主党的怀抱，堪萨斯州州长和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席位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竞争向来都存在其他因素，但很难相信贸易没有发挥作用。宾夕法尼亚州也有一些席位转向民主党，这可能与法院重新划分区域边界有关，这一行为旨在消除立法机构对共和党人的支持。除此之外，传统观点和地区差异像往常一样占了上风。支持现有贸易政策的沿海现任者基本上实现连任，对贸易政策持怀疑态度的铁锈带（指美国北部衰败或萧条的工业区）现任者也实现连任。

一个未知数是，总统在竞选后期将把主要重点转向移民，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与贸易有关的结果。特朗普最初曾表示，他希望自己的贸易政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但在最后三周，他显然更关注移民问题，而非贸易。

因此，除个别情况外，从贸易角度来看，中期选举结果符合传统。选民大多是根据其他问题进行投票。

另一个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这更难回答。在人事方面，现在就说会有很多变化还为时过早。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九名共和党人将不会重返（出于各种原因，包括退休或竞选别的职位），委员会将增加许多民主党人，以反映他们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有趣的是，罗恩·金德和比尔·帕斯基尔两位议员在竞争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德一直是支持当前贸易政策的民主党领袖，帕斯基尔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协定的批评者，因此通过谁当选可以判断该党未来的走向。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变化较少：两名共和党人和一至两名民主党人（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竞选结果）将离职，但由于哈奇参议员退休，主席人选将发生变化。有人说，也许领导人会以此为契机，将委员会的规模从 26 人缩减到接近传统的 20 人。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委员将不会有新成员，但我十分怀疑他们会放弃提拔自己青睐的同事的机会。

最后，虽然媒体已经注意到相当多的支持当前贸易政策的共和党人将不会重返席位，但有关新来者观点的说法则较少。我们通过研究民主党众议院获胜者的公开声明，进行了快速研究。到目前为止，其中有 17 人支持当前贸易政策，4 人持怀疑态度，11 人立场不明。当然，贸易投票通常是针对具体的协议而不是模糊的政策立场，所以预测是有风险的，但至少表明，许多即将上任的民主党人会对贸易保持开放态度，开始计划美加墨协议（USMCA）的葬礼是错误的。

本文原题为“Midterm Election Results-What Did It Mean for Trade”。本文作者 William Alan Reinsch 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部主席。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CSIS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佩克的困境

Frank Verrastro, Kevin Book, Larry Goldstein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几个月来，国际能源市场遭遇了重大波动，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超过 20%。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欧佩克组织将做出怎样的反应？笔者综合各方因素给出了分析。编译如下：

欧佩克组织（OPEC）历来致力于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塑造并维持对其有利的平衡状态。但从历史来看，市场规律和突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常常使得欧佩克的努力付之东流，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又一次向我们生动地阐释了这个道理。上个月，特朗普总统猛烈批评了欧佩克组织，这些口角之争的背后反映着市场对一系列复杂的逆向冲击的担忧。这些冲击包括：美国、沙特、俄罗斯原油产量持续增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石油开采业即将面临季节性调整（维护开采和精炼设施、天气原因等）；地缘冲突风险增强等。笔者认为，尽管今年年底全球原油市场供给依然存在短缺，但最迟到明年年初，市场供给一定会重新达到过剩。

最近几周以来，国际原油市场出现了一系列新动态。在这些事件中，一些是早先被市场预料到的，而另一些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沙特和俄罗斯两国原油的实际产量都超出了市场预期水平，而美国的石油日产量也将很快达到 1200 万桶；伊朗的原油出口量暂时下降，但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原油出口已趋于稳定，而伊拉克很快也将增加原油出口；此外，美国政府 11 月 5 日宣布暂缓对伊朗制裁（为期六个月）的决定也大大鼓舞了市场情绪。

与此同时，市场也普遍下调了对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预期。受美元走强，美股下挫等因素影响，在过去两个月内，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下跌了超过 20%。

在这一背景下，欧佩克组织联合部长级监控委员会（JMMC）于本周末在阿布扎布召开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政策调整，并为 12 月 6 日即将召开于维也纳的欧佩克会议确定基调。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环境，JMMC 的与会成员不出意料地讨论了有限的减产计划（日产量大约减少 100 万桶），并向外界强调目前国际原油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即将形成，欧佩克组织将努力维持原油市场的微妙平衡。

不过，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可能在于欧佩克组织将如何在成员国内部分配减产配额。举例来说，沙特石油部长 al-Falih 在会议上就大诉其苦，表示早在会议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就已经计划大幅减少 12 月原油产量了（尽管这其中也有不少国际油价暴跌的因素）。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欧佩克成员国如何达成协议。另外，考虑到中期选举后的美国国会可能重新考虑讨论反欧佩克法案（No Oil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Cartels Act, NOPEC）、卡舒吉神秘死亡事件持续发酵，以

及美国制裁伊朗的力度尚不明确等因素，下个月即将召开的欧佩克会议仍可能存有变数。

无独有偶，目前来看制裁伊朗对市场的长期冲击效果依然不甚明朗。美国政府或许是想通过暂缓制裁的方式，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审慎渐进地减少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并利用近期国际原油供应逐渐过剩的大环境，尽量避免刺激国际油价重新上涨。但是，目前美国公布暂缓执行对伊制裁的截止日期是明年5月，而根据我们的测算，届时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将再次上升。如今，美国早已成为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因此，倘若油价剧烈波动，则美国国内的石油供给也会遭受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估计下个月即将召开的欧佩克会议将达成新一轮的减产协议。另外，我们同时也认为沙特和科威特将暂时搁置备受期待的中立区石油联合开采计划。当然，我们也需要提醒读者注意，任何突发的地缘政治事件都可能使我们的预测不再准确。

本文原题为“OPEC’s Dilemma—Markets Are Complicated!”。本文作者 Frank Verrastro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副主任；Kevin Book 和 Larry Goldstein 是 CSIS 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央行正处于重大政策错误的边缘

Desmond Lachman /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尽管欧元区三季度 GDP 增速创四年多新低，但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依旧对欧元区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乐观。编译如下：

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 10 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的乐观态度，让人们回想起泰坦尼克号船长的轶闻。当被问到为什么他没有让船转向以避免冰山时，船长回答道“什么冰山？”。

就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一样，德拉吉认为欧洲央行不需要通过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债券购买计划，来改变不再用货币政策实行刺激的决定。尽管欧洲和全球经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脆弱迹象，但他依然这样做了。

在德拉吉看来，欧洲正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复苏，通货膨胀正在上升，风险水平适中。但自从欧洲央行上次会议以来，“乌云”已经在意大利上空聚集，而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主权债券市场。有明显迹象表明，意大利正在与其欧洲伙伴发生冲突，这可能对欧洲银行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罗马方面无意接受欧盟对其庞大预算进行修订的要求。该预算案公然违反欧元区的规定，并威胁到意大利的公共财政。正如欧盟委员会上个月向罗马方面发出的前所未有的投诉信所强调的那样，布鲁塞尔方面考虑到欧元区的预算规定，并不准备予以通过意大利的预算案。

虽然德拉吉可能会对意大利的预算危机视而不见，但市场并不会如此。意大利债券息差已经上升至 300 多个基点，资本十分迅速地流出意大利。这可能会使意大利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并且会加剧公共债务和银行业问题。

虽然意大利似乎是欧洲经济前景面临的最严重风险，但它并不是唯一威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执掌的英国政府准备在 2019 年 3 月底前，不通过退出协议而直接退出欧盟。届时，为期两年的第 50 条款谈判期限将满。与此同时，德国经济放缓的风险进一步上升。美国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将于 12 月退出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层后，柏林方面的政治困境日渐严重。

如果事实证明德拉吉忽视明显的警告信号，并且欧洲经济确实趋于衰退，他也不会是第一个犯严重政策错误的央行行长。早在 2008 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并没有将次贷危机严肃对待。德拉吉的前任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 2008 年雷曼兄弟破产前的几个月内，非常不明智地选择加息，导致欧洲经济进一步恶化。而如今的欧洲经济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日渐衰弱的境况。

本文原题为“ECB on Brink of Egregious Policy Error”。本文作者 Desmond Lachman 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员，他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和审查部副主任，以及所罗门美邦的新兴市场经济首席战略分析师。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退出 WTO 对美国关税有什么影响？

Chad P. Bown, Reginald Jones /文 李芳菲/编译

导读：美国总统特朗普自 2017 年以来曾多次表示希望美国能够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并在今年七月份下达命令起草了《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废除最惠国条款，要求在进口关税方面平等对待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的关税究竟有何影响？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总统是否有权利将美国拉出世界贸易组织并下令征收更高的关税？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已明确表示了他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蔑视。2017 年 10 月他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为了除我们之外的所有人的利益建立起来的。他们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占这个国家的便宜。”2018 年 3 月，特朗普在宣布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计划时声称：“世贸组织对于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这对中国来讲是伟大的，但对于美国则是可怕的。”

2018 年 6 月，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总统曾多次表示希望将美国从世贸组织的泥潭中拉出。总统顾问们压下了这份报道，正如特朗普总统后来所否认的：“我没有在谈退出 WTO 的事情”。但他还是补充道：“我们处理得特别差……这是不公平的。”

尽管特朗普总统否认，但还是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基本证实了这一想法，称“如果他们不改弦更张，我就退出 WTO”，并辩称建立这一机构的协议“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

Axios 在七月初报道，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有具体的计划要采取这一行动，根据总统特朗普的命令，政府起草了名为《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废除最惠国（MFN）条款，要求美国在其货物进口关税方面平等对待所有世贸组织成员。这一举措将使得总统可以提高关税税率，甚至是在此前的贸易谈判回合中已确定加以“约束”（固定）的税率。

鉴于特朗普总统已经把美国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中撤出，并一再威胁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仅仅是提出美国将退出世贸组织（WTO）这一想法就已经给华盛顿乃至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在特朗普任职总统之前，美国退出世贸组织（WTO）的可能性从未被纳入考虑范围。现在，这一举措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份政策简报中介绍了其中的两项。其一，美国退出 WTO 对美国的关税有何影响？其二，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总统是否有权力将美国拉出世贸组织并下令征收更高的关税？

1、美国退出 WTO 将如何影响关税税率？

如果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将免除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大多数进口产品征收最惠国关税的义务。然而，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并不会随之自动改变，这一步骤将需要总统撤回先前关税优惠的行政命令方可得到施行。如果美国退出 WTO，即使美国的关税义务保持不变，其他国家也可以自由采取歧视政策。因此，只有美国打算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关税，退出 WTO 才有意义。

因美国退出 WTO 而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产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美国将按照以 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依据达成的第一项贸易协定，取消所有通过谈判达成的关税削减，即所谓的“关税减让”。

此前国会在 1930 年的关税法中确定了进口关税税率，即通常所说的 Smoot-Hawley 关税。但从那时起，因 1930 年达成了互惠贸易协定，总统就开始通过行政命令首先降低了进口关税，之后因 1947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一次会议谈判达成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多边回合关税谈判多次下调关税，其中著名的有肯尼迪回合（1964-1967）、东京回合（1973-1979）和乌拉圭回合（1986-1993）等。根据世贸组织（2017），约有 99.9% 的美国进口关税受到这些谈判协定的约束。如果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总统可以发布行政命令，废除所有通过谈判达成的关税削减，进口关税可以恢复到 1930 年由国会规定的税率水平。（这样的行政命令不会影响适用于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关税水平）。

在美国统一关税表（2018）修订版 11 中，主要有两个栏目。第一栏是最惠国关税，第二栏是 1930 年关税。在标题、副标题编号之后，物品描述、数量、单位三列列示。第一列分为一般和特殊两个子列：一般列为最惠国关税；特别列通常列示“免费”，并列出示享有免税待遇的国家或免税方案。这些取得税收优惠资格的国家，要么是因为它们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要么是因为它们被美国单方关税优惠计划所覆盖，例如普惠制（GSP）或是《非洲发展暨机会法案（AGOA）》等。1930 年制定的税率中，进口“锡条、锡棒、锡型材和锡线”在最惠国待遇下按 3% 的税率征税；而对于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则是免税，或是作为其关税优惠计划的一部分；非最惠国待遇则征收税率 45%。

第二栏只针对古巴和朝鲜两个国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巡逻队 2017）。其他国家要么是有权享受第一栏最惠国待遇的世贸组织成员国，要么至少是名义上可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这些国家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如加拿大、墨西哥等，对大多数双边贸易均实行零关税，或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普惠制（GSP）、《非洲发展暨机会法案（AGOA）》或其他单边关税优惠方案对某些产品实行零关税。

第一栏和第二栏的平均进口税率有多高？关税表将商品分为 23 个部分、99 个章节，对特定的商品划分 11,621 个征收关税细目。有多种方法可以对这些成千上万的关税税率进行浓缩汇总，本政策简报主要考虑两种互补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对总进口额或应课税进口额计加权平均关税。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2018）的数据，2017 年进口加权平均关税为 2.0%，应税进口的平均关税则为 4.7%。应税进口被定义为商品关税税率大于零。

区分应税进口和免税进口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互惠贸易协定和 1947 年的原始关贸总协定（GATT）之前，国会就允许很大一部分外国商品免税进口。这些商品包括咖啡、茶和香蕉等消费品，以及锡等非美国加工生产的原材料。然而，大多数制成品都要征收一定的进口税，因为一些国内生产商寻求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在 2017 年，美国大约 70% 的进口产品免税；而在 1930 年则约有 65% 的美国进口产品免税。

衡量一个国家关税水平指标——加权平均进口税率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善的。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关税高的商品不会大量进口，平均占比低，所以该计量结果是向下偏移的。例如，如果某一商品被施加以 100% 的关税，以保证该类别不会有进口（称之为“禁止性关税”），那么该关税将不会增加任何收入，那么，关税非常高的商品得到了零权重，即实际上在贸易加权平均数中未计入权重，没有计量。

第二种方法是对关税代码中的所有税率进行简单平均。2017 年美国的最惠国适用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 3.3%。使用简单平均这一方法避免了高关税产品由于进口水平低而权重小的问题，但其局限性在于即使关税每个关税细目都获得了相同的权重，不同的税率水平可能对应着相去甚远的贸易量。虽然大量的低关税对进口影响很小，少数的高关税对贸易量影响巨大，但简单平均数则将之忽视，仅仅把每个观察到的关税细目税率视为同等权重。

总而言之，不存在衡量一国平均关税的完美方法，但简单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在易于计算的同时确实揭示了有关一国进口关税近似水平的有用信息。

然而，美国平均关税标准和现有的政策措施忽略了其统一关税表第二栏下的税率。鉴于美国可能退出 WTO，第二栏的关税问题现在看来尤为重要。

表 1 2017 年美国关税表及第二栏关税计算

类别/部门	2017 年关税, 简单平均	第二栏关税, 简单平均	2017 年关税, 进口加权平均	第二栏关税,进 口简单平均
广义经济范畴	3.3	32.3	2.0	28.1
消费品	4.6	35.5	4.8	39.6
半成品	3.0	31.0	1.4	26.4
生产资料	1.4	34.3	1.6	35.0
按部门				
动物制品, 活动物	2.2	5.2	1.1	3.8
蔬菜制品	2.9	11.7	2.6	5.4
动植物油脂	3.6	11.7	2.7	3.4
食品、饮料、烈性酒、醋、 烟草制品、食用油脂	6.1	20.2	3.2	12.8
矿产品	0.2	6.4	0.2	0.7
化学制品	2.3	29.2	1.2	17.8
塑料橡胶	3.2	35.2	3.5	39.9
皮、皮革等	3.5	29.1	10.7	44.2
木材和木材制品	1.1	17.9	0.8	16.6
木浆、废纸或纸板浆	0	22.3	0	23.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8.2	58.1	14.5	70.2
鞋类、头饰、雨伞、羽毛 等	7.6	42.4	10.3	33.4
石材、水泥、石膏、陶瓷、 玻璃器皿等	3.0	40.2	3.2	38.0
珍珠、宝石等	2.1	28.7	1.0	27.5
贱金属和贱金属制品	1.5	28.4	1.3	26.6
机械、机械设备、电气设 备	1.2	32.9	0.8	35.0
交通工具: 车辆、飞机、 船舶	2.5	21.9	2.3	10.1
精密仪器; 光学、外科等	1.6	40.3	0.5	39.2
武器弹药	1.0	45.7	1.3	48.5
其他	2.8	43.7	1.3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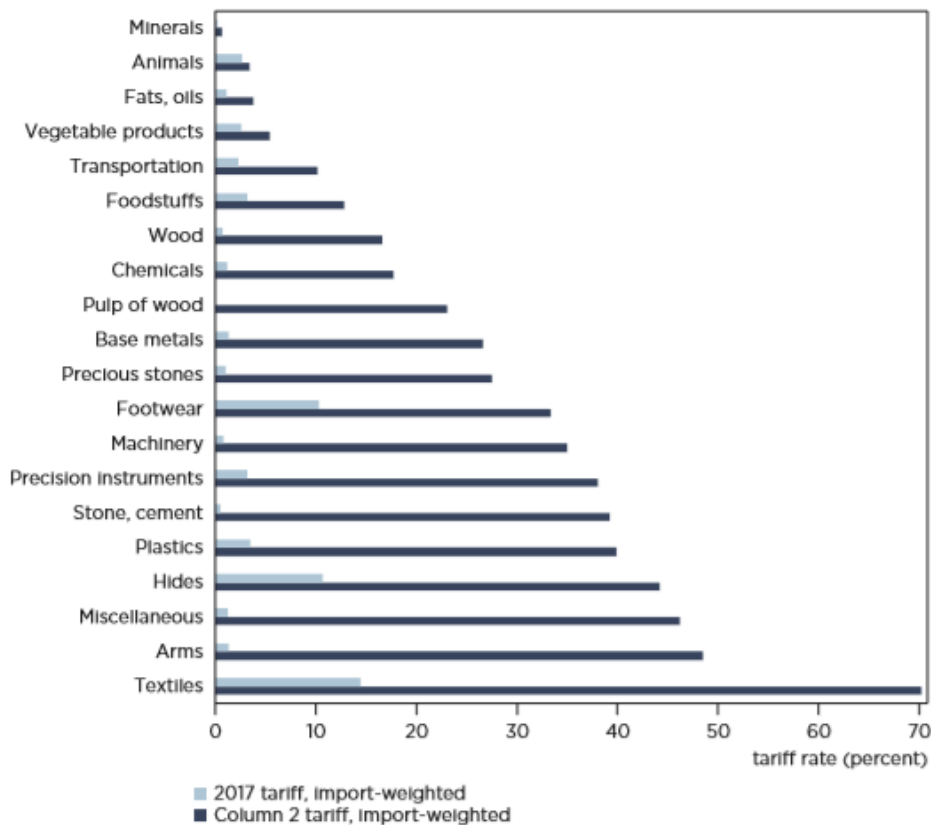
那么, 如果假设美国退出 WTO, 从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第一栏关税转向第二栏关税, 又该怎么办呢? 平均关税又会有多高?

表 1 通过比较第一、第二栏税率给出了答案。第一栏中简单平均税率 3.3%, 第二栏简单平均税率则达到了惊人的 32.3%。当按美国的进口额加权计算, 第一

栏的加权平均关税为 2.0%，第二栏的加权平均关税则高达 28.1%。进口加权关税税率低于简单平均税率的原因在于，高税率类别的进口量低，指标中所占权重较小。对于美国统一关税表上所有的八位代码关税细目，第二栏关税未加权的简单平均数最小为 0，最大为 350%，标准差达 35.9。

表 1 还报告了按广义经济类别（消费品、半成品和生产资料）划分的平均关税。一般而言，消费品的关税高于半成品和生产资料，这种现象被称为“关税升级”。这种关系在各国、各部门内以及跨国、跨部门间都很常见（Bown 和 Crowley 2016），因为各国往往倾向于对半成品和生产资料征收低关税，以鼓励进口半成品和生产设备，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

图 1 2017 年美国关税及按部门划分第二栏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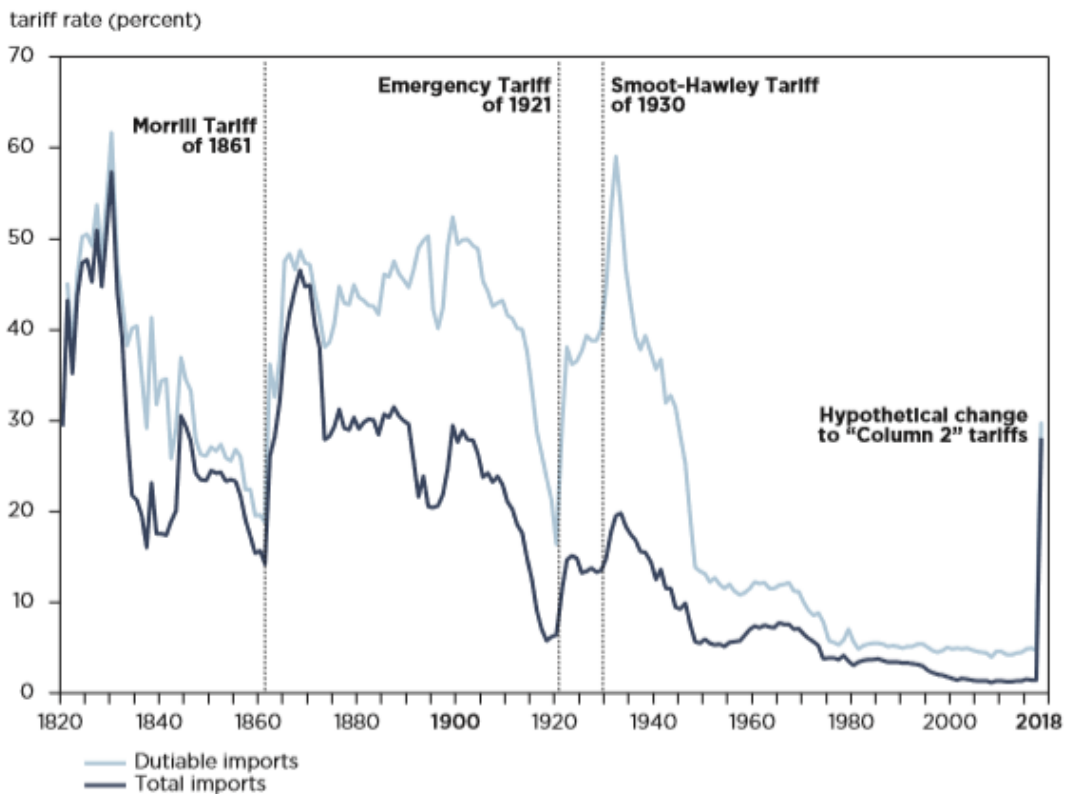
如果从第一栏关税水平转移到第二栏，又会发生什么呢？对于消费品而言，简单平均关税将从 4.6% 提高到 35.5%；半成品的关税将从平均 3.0% 提高到 31.0%；生产资料关税将从平均 1.4% 提高到 34.3%。相比于能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获得这

些原材料投入的别国企业，征收这部分关税将大幅提高美国公司的进口成本，削弱其竞争力。

此外，表 1 也按部门报告信息。在少数情况下第一栏和第二栏关税之间差异很小，比如说动物制品和矿产品等。不过，如图 1 所示，大多数情况下一二栏间关税费率差异巨大，木浆和相关产品关税从 1.1% 上升到 17.9%，纺织品关税从 8.2% 上升到 58.1%，机械从 1.2% 上升到 32.9%，精密仪器从 1.6% 上升到 40.3%（图 1）。

这些数字在令人震惊之余，还具有几个重要的经济含义。首先，这些数字表明，由于之前的贸易谈判，美国的进口关税下降幅度之大。如果 1930 年制定的税率不变，平均关税将是 28% -32%，而不是现在的 2%-3%。

图 2 美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1820-2017）及 2018 年第二栏假定关税



其次，退出 WTO 并迅速恢复第二栏关税，或将是美国历史上关税增幅最大的一次。图 2 使用总进口和应税进口贸易加权平均数，从历史的角度看潜在关税变化。转向第二栏汇率将使美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或 40 年代初以来未曾出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流行的水平。虽然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同样很高，但法定税率从未出现如此突然的巨大变动。

以 1930 年臭名昭著的 Smoot-Hawley 关税为例，其调整比图 2 所反映的要温和的多。根据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1930 年的报告，如果 1930 年的新关税适用于 1928 年的进口，则应税进口的平均关税将从 38.75% 提高到 41.14%，仅增加 2.4 个百分点和 6%。（Irwin 2011, 102-103）

图 2 显示应税进口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的增幅远大于法定关税的 2.4%，原因在于 1929-1932 年进口价格下降，即使 Smoot-Hawley 并没有增加法定关税（Irwin 1998），但由于美国关税增设额外限制，而大多数关税税率依据具体关税细目而定，因此进口价格下降反而意味着从价计征的关税增加。

我们在此强调，这是一个极端假设的场景。若当下平均关税增加 26 个百分点，对美国经济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急剧增加的生产资料、半成品关税将迅速提升美国本土的生产成本，重创美国工业的竞争力，面对美国境外 70 多亿消费者，美国出口制造生产基地的吸引力也将不复从前。最终产品的关税同样急剧增加，美国生产商们面临的竞争或将随之减少，伴随着美国消费价格的上升，高物价或将使得某些特定商品对于美国人而言“消费不起”。

此外，美国退出 WTO 并大幅度提高关税，必将遭到外国对美国在出口税率上的报复。关税问题将使得美国对公司的投资和生产不再具有吸引力。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的进口关税并未因此而改变，其退出 WTO 依然意义重大。美国将不再受到关税政策的限制，其他国家在对美出口中将面临无限制的关税。为应对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征收的钢铁和铝关税，五个贸易伙伴几乎立即对美国逾 230 亿美元的出口进行了反击，一旦美国全面提高关税将很可能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地对美国出口采取歧视政策转而支持与他国的贸易往来，美国无法反对，唯一的应对方式只能是反击报复。鉴于美国此前已经提高过一次关税来限制进口，提高关税的反击效果将大大受限。

即使只是取消了对关税的限制，而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关税，退出 WTO 依然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或将不利于投资和贸易，特别是对那些试图开拓海外市场的美国公司和出口企业工人而言。

2、总统是否能够单方面将美国拉出世贸组织？

类似于 WTO 这类的贸易协定条款中并没有明确赋予美国总统“单独退世”的权利；政府部门能否行使此权力在法律上同样未加以明确。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没有经国会批准、总统单方面试图退出贸易协定的先例，因此送到美国法院也没有法律先例可循。

部分法律学者如 Trachtman 等认为，根据宪法第一条，管理对外贸易的宪法权力仅授予国会；总统无权退出贸易协定。其中，Trachtman 给出的理由是，总统单方面要退出世贸组织的行为并不符合国会独占商业权力的宪法规定。

而在其他的调查中，关于总统是否拥有合法权利以单方面将美国拉出世贸组织，调查结果则要乐观得多。Hufbauer（2017）指出贸易协定在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担心这一作用可能被用作法律依据，以证明总统根据宪法第二条授予政府部门缔结条约的权力的合法性。另一种猜测是美国政府部门可以拥有合法权利，可以单方面退出世贸组织，但并不会发布新的美国关税统一表。

美国的许多贸易法都以国会更有可能推动实施保护主义措施或退出贸易协定而非任何一届总统这一观点为前提。这一前提反映出战后的美国国会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更容易向贸易协定的制定施压，而行政部门则更致力于推动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倾向。因此，政府部门的职责在于就贸易协定条款进行谈判。即便如此，总统也不能单方面行动，因为所有现代的美国贸易协定不仅包括关税条款，还包括了可能要求修改的美国国内法有关非关税壁垒方面的规则制定，所以它们要求有立法权，以及需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所以，所有的美国贸易协定都是由国会部门来负责制定并通过的。

例如，美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在 1993 年国会颁布《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时确立的，它的颁布确保了协议中的许多条款被编入美国国内法。如果这些法律不再有效，就需要国会明确废除这些法律，而在这项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赋予总统退出世贸组织的权力。《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第 125(b)条规定了“国会不批准美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程序，但没有关于总统不批准美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平行规定，国会立法中并没有考虑到行政部门将美国从世贸组织中带走的偶然性（GPO 1994）。或许，如果总统想要将美国拉出世贸组织，他/她将不得不通过国会来实行这一举措。

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同意退出 WTO 的举动将可能受到来自法院的质疑，而因这一举动利益受损的各种商业利益集团也将可能对总统特朗普这一行动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参见 Bown 和 Keynes 2018）。美国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将会如何裁决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根据美国法律判定特朗普总统的行为合法，或将给美国的对外贸易造成灾难性的打击。总统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使得消费者及依赖于进口的制造商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包括农民和制造商在内的出口商遭受来自外国的报复打击，这都将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退世”举动很可能会严重削弱世贸组织，这一组织由美国在经历灾难性的二战后所建，促进和平稳定的商业关系逾七十年。退出世贸组织有损美国的海外经济和安全利益，并进一步引发更大的问题。或许，将会有新的规则体系来取代世贸组织（WTO）的存在。

本文原题为“[What Might a Trump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an for US Tariffs?](#)”。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Reginald Jones 高级研究员。Douglas A. Irwi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新兴市场的风险黑天鹅

Carlos Vegh, Guillermo Vuletin /文 张子莹/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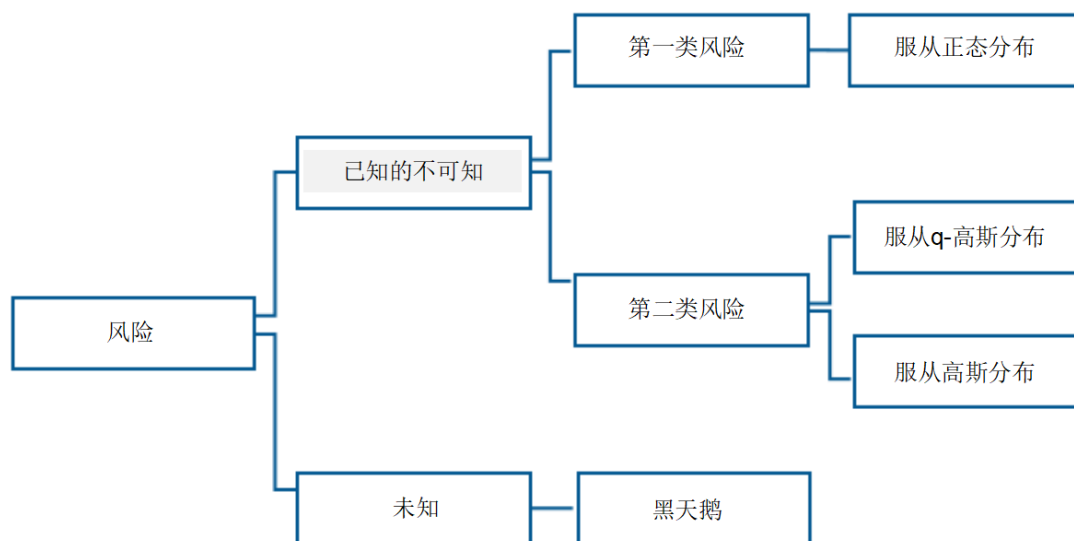
导读：在面对众多的国内外风险时，新兴市场往往更容易受到影响。我们根据这些风险的可预测性与安全性，对其进行分类，并以此开发了一个框架。随着预期外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风险担保的难度也会不断提高。但如果出现不可预测且影响重大的极端情况(如“黑天鹅”)，各国只能依靠经济体强大的复苏力，或寻求来自外部的援助。编译如下：

政策报告、金融媒体和多边组织高级官员都在频频警示，一场真正的风暴或将袭击新兴市场。这场风暴能够瘫痪各种政策和机构，并给经济带来外部冲击(如商品价格下跌、债务成本上升、外部需求萎缩)。然而，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保险工具悄然兴起，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此类风险。相比通过预防性储蓄等高机会成本的方式来防范风险，通过市场防范风险，成本则更低。另外，以各国的稳定性为基础对风险进行分类，将有助于决策者建立更健全的风险管理组合。

从已知的不可知性到黑天鹅

在最近的世界银行报告中。我们根据新兴市场潜在风险的可预测性，对不同类型风险进行了分类。如图 1 所示，我们把风险分为可预测（已确定是未知的）和完全不可预测（通常也被称为“黑天鹅”）事件。

图表 1 风险分类



与已知的不可知性不同，黑天鹅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911 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一场大地震突然袭击纽约也是不可预知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弱这种破坏性的不可预测事件的影响，新兴市场只能不断巩固基础，例如完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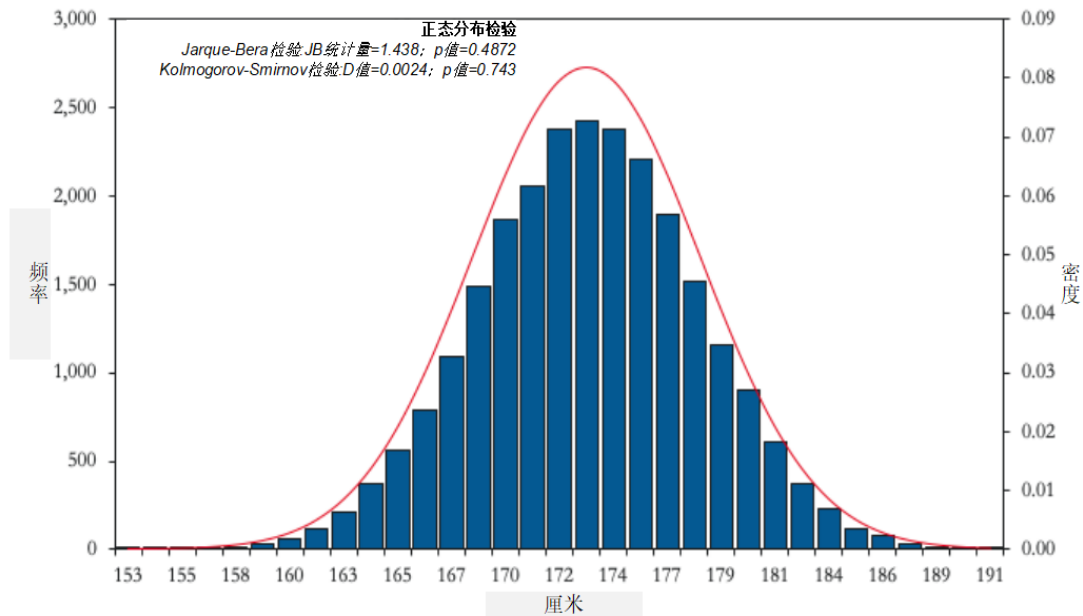
国家安全体系及外交政策、有能力的负责人、完善的基础建设等。外部援助的快速部署也是新兴市场对抗黑天鹅的另一个关键。

图 1 中，我们又把已知的不确定性分为标准正态分布（第一类事件）和厚尾分布（第二类事件）。第一类的事前风险可以完全被量化，它的前两阶矩（均值和方差）就是它的全部特征，因此对它的担保相对廉价。第二类事件的分布虽然与正态分布基本相似，但尾部比正态分布更厚。厚尾分布的风险通常更难测算，且担保成本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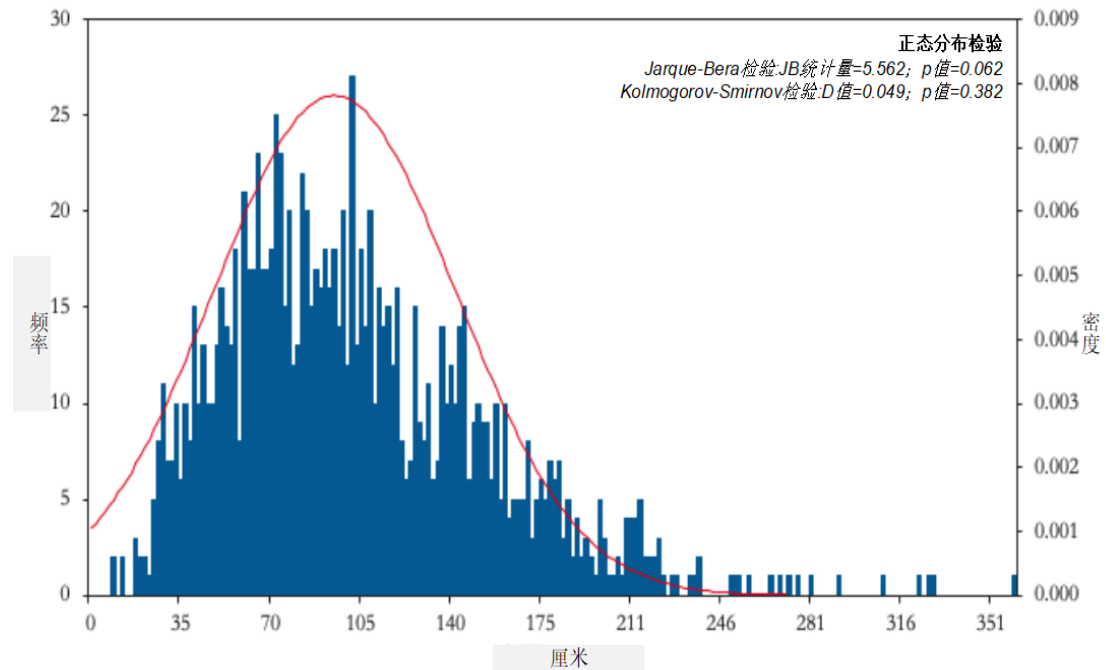
第一类、第二类风险

现在我们分析一些新兴市场面临的一类、二类风险实例。经济变量不同于那些总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自然现象，但有一个例外就是降雨。即使极端的尾部事件，比如连续暴雨持续整整一个月，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气候特征，该风险的事前分布是不变的。因此在乌拉圭，存在可以为干旱或能源短缺进行担保的金融工具。2014 年，乌拉圭政府还发布了降雨看涨期权，该期权以降雨指数作为执行条件，以油桶作为基础资产。

图表 2 第一类事件-人类身高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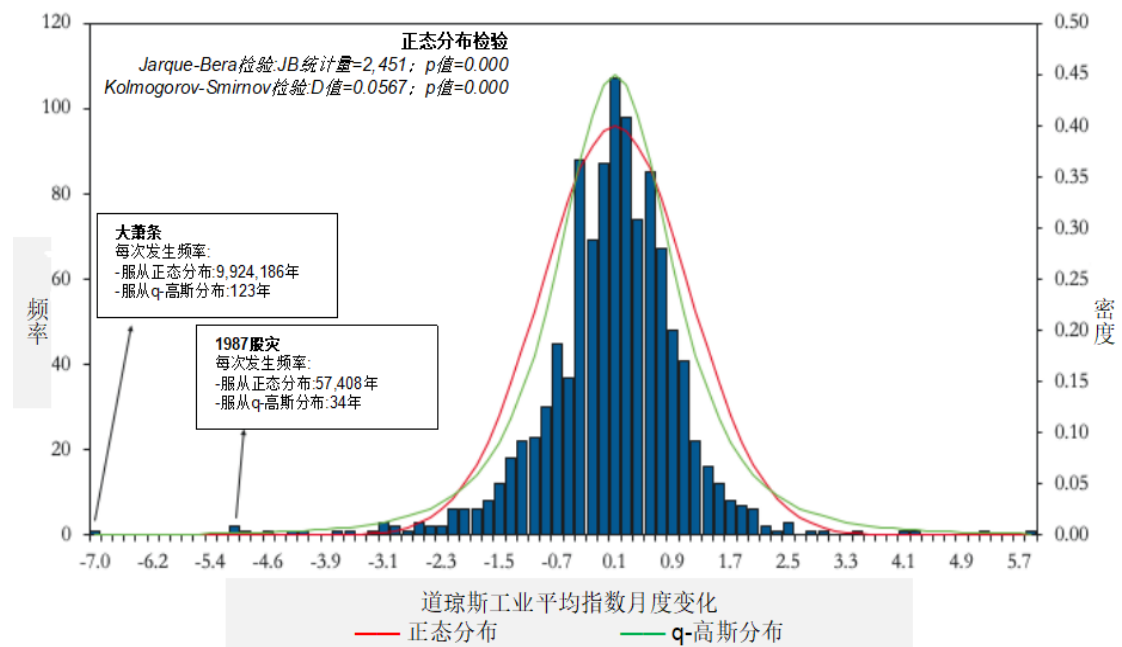


图表 3 第一类事件-乌拉圭的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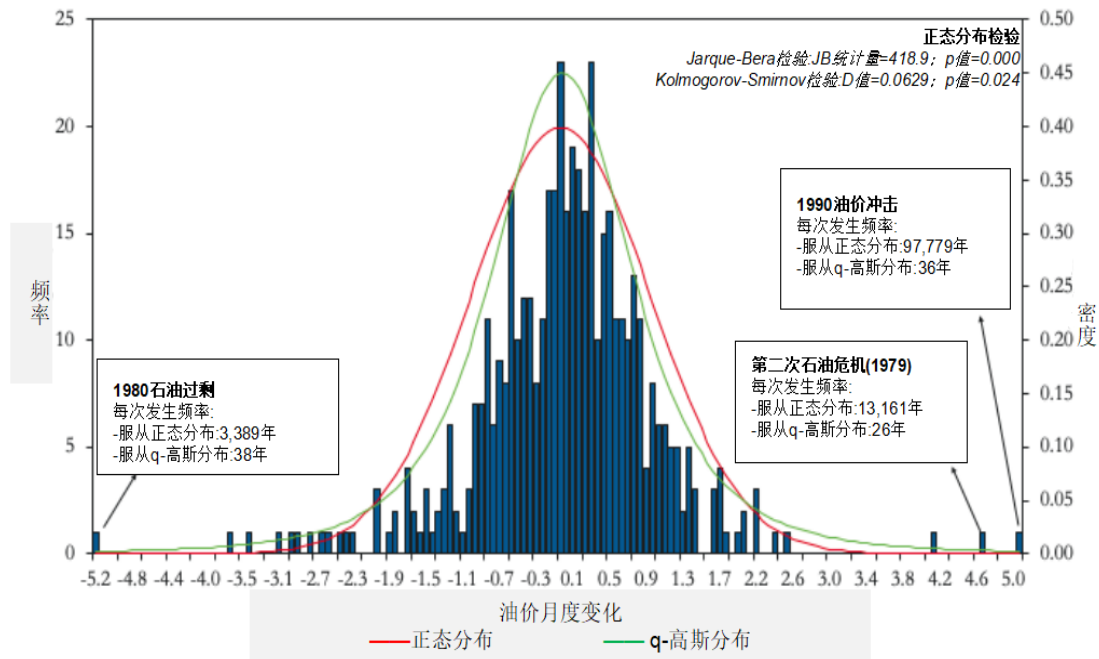


很多二类风险会被人们错误的当成一类风险处理。图 3 是两个明显的例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油价百分比变化。虽然两种分布都遵循典型的钟形曲线，但尾部极端事件的数量较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拒绝它们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因此，众所周知，如果把一家石油企业当成服从正态分布，并对其进行担保，将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高斯分布可以预测大萧条这样的事件在每个世纪都会发生，但正态分布则认为这样的事件每 1000 万年才发生一次（即从不发生）。

图表 4 包装成一类事件的第二类事件-道琼斯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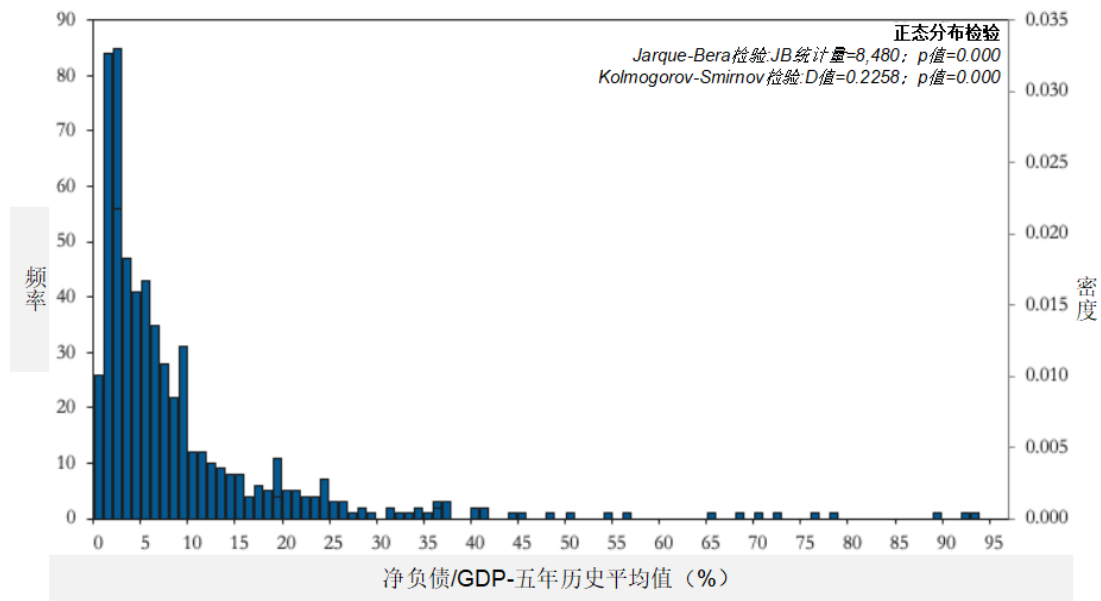
图表 5 包装成一类事件的第二类事件-油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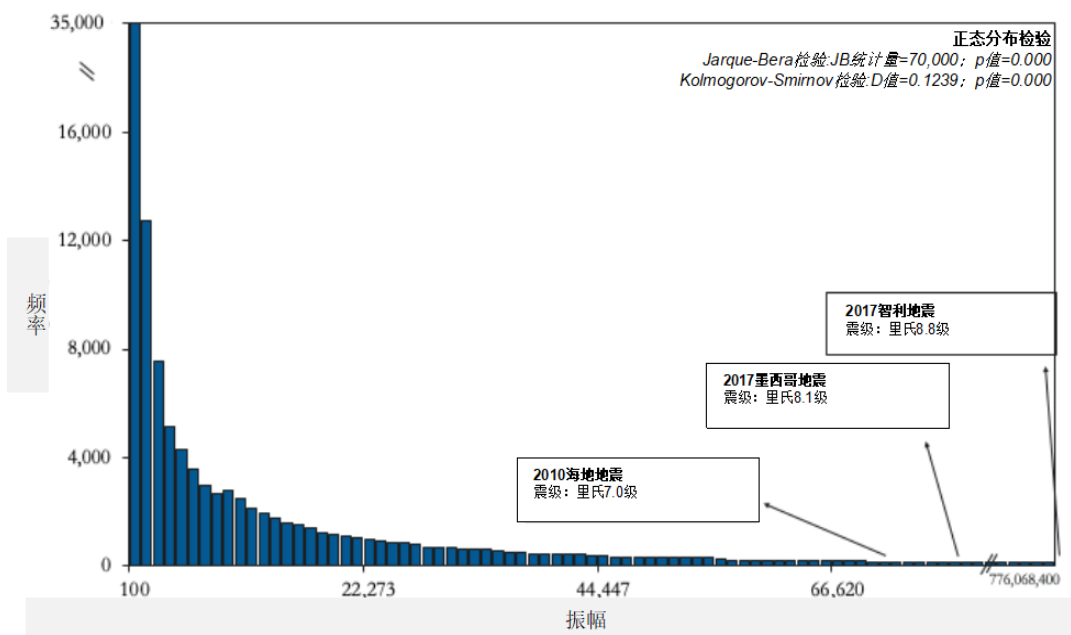
任何经营衍生品业务的交易者都不应忽视大萧条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与 Black-Scholes 公式得到的价格相比，提高风险厌恶程度或假设其分布具有厚尾性将给期权带来显著的风险溢价。虽然 Black-Scholes 公式仍是现在期权定价的基准，但市场参与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市场存在第二类风险的可能性，因此往往会在 Black-Scholes 价格的基础上再给出溢价。撇开风险不谈，国际衍生品市场为新兴市场提供了投保这些风险的良机。以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对冲，墨西哥石油对冲为例，自 2001 年以来，墨西哥平均每年购买 0.1%GDP 的看跌期权，以预防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在 2009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墨西哥都做了类似操作，支付额分别占 GDP 的 0.5%、0.6%和 0.3%。

在第二类风险中，我们发现单个极端尾事件对样本前时刻分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图 4 是许多新兴市场中都存在的两个重要实例：国际资本流动的骤停与自然灾害。这些风险更偏向于幂律分布，其尾部事件发生的概率更高。

图表 6 第二类事件-国际资本骤停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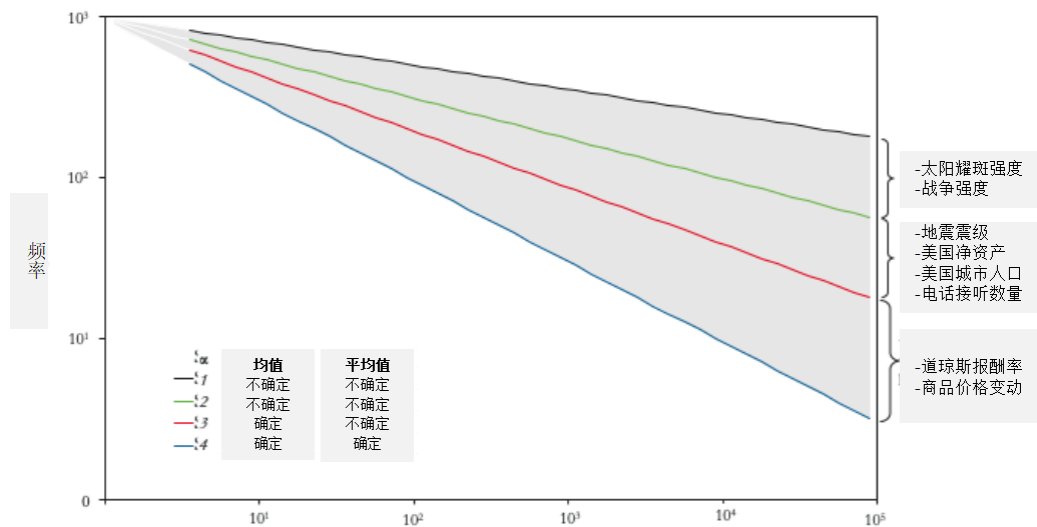
图表 7 第二类事件-地震震级



一般来说，尾部越厚，样本分布中有限矩的阶数就越少。图 5 显示了对数幂律分布的尾部，其中 α 是概率密度函数的指数，它的大小反应了尾部的斜率。 α 越高，斜率越陡，厚尾事件的概率下降得越快。比如， q -高斯分布具有相对高的 α ，这意味着它们的矩是有上界的，即均值和方差都很容易被确定。当 α 变小时，

就像地震和资本骤停的情况一样，有上界的矩阶数变少。对于那些连一、二阶矩都没有上界的风险而言（即事前的均值和方差均不可测），为它们来定制保险产品就极其困难。拿当下来说，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对国际资本流动骤停保险的金融产品。

图表 8 幂律分布



巨灾债券

在保险市场上还是有好消息的。近年来，保险市场的发展使新兴市场能够通过巨灾债券对部分自然灾害进行保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太平洋联盟的巨灾债券（CAT 债券）。2018 年 2 月，世界银行发行了一种巨灾债券，为太平洋联盟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提供 13.6 亿美元的地震保护保险。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主权风险保险，也是巨灾债券市场历史上的第二大笔交易。CAT 债券利率虽高，但一旦发生地震，发行方将不再偿还剩余利息，也不再返还本金。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发行方来说，选择一个地震风险较小的目标国家组合可以降低巨灾债券的成本。因此，未来发行 CAT 债券时，发行方如果将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家纳入组合，可以进一步降低保险成本。

在以上环境下，世界银行不仅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向国际投资者有效转移风险，还可以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之间进行调节。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保险方案最多只能提供已发行债券本金这么多的财政援助，通常无法弥补灾难带来的巨大损失，巨灾债券的保险还需要预防性储蓄、经济弹性和一些专用基金加以补充。

结论

面临新兴市场中的突发事件时，了解风险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将风险分为“已知的不可知性”和“完全未知”两类。事前保险只适用于已知其分布性质的风险，其可用性随着可预测性的降低而降低。但好消息是，保险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实现了较好的发展。如今的新兴市场即使遇到注入自然灾害的“厚尾”风险，也可以对其进行事前保险。与此同时，针对于新兴市场如何面临潜在风险的研究仍在继续，在不远的将来，更有效的保险组合将被应用于金融工具中。

本文原题为“On Risk And Black Swans in Emerging Markets”。本文作者 Carlos Vegh 为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Guillermo Vuletin 先生为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期选举的影响

Leslie Vinjamuri, Peter Westmacott, Amy Pope 和 Peter Trubowitz/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民主党重新执掌众议院，而中期选举也可能会对未来美国国际、经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由四位专家的讨论组成。编译如下：

Leslie Vinjamuri 在《美国正在分裂，但不再洋洋得意》中写道，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总统的检验，在此之后，只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美国正在分裂。一些人美国人投票反对特朗普，而另一些美国人则选择投票支持他。

这种分裂可能会在接下来两年影响美国的政治。在国会上，这种分裂已经初见端倪。但在未来，它会出现在美国的方方面面。

这一问题在两个领域非常突出。其一是贸易战。美国可能会面临着更加深远的贸易冲突，并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这成为现实，贸易可能会成为 2020 年总统选举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文化战。分裂远比议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强调的更加严重。超过 100 位女性被选举成为议会议员，其中也包括第一位公开出柜的美国同性恋议员。民主党会与共和党持续角力。

对于共和党而言，他们也应该考虑是否严格执行特朗普的政策。在经济增长强势、创造就业和小时工资提高的情况下，美国人可能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特朗普偏离传统的风格可能会导致利益无法获得。特朗普的选举策略强调了移民问题，而非经济问题，这也体现出普通美国人认为减税只对富人有利。今天，美国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国家。

过去两年中，欧洲人认为美国是世界规则的破坏者。而那些乐观的人则认为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有一系列创新行为，而美国对国际主义的破坏终将过去。

这次选举没有为这种争论盖棺定论，但选举确实表明美国人不再自鸣得意——选民投票率达到史上最高水平，许多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如移民等，都具有全球影响。

所以当前欧洲的策略可能是等待当前任期结束，许多迹象表明 2020 形势会发生大的变化。

Peter Westmacott 在《中期选举很难改变近期国际争端》写道，这一次民调终于预测了正确的结果。在昨天的中期选举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蓝色浪潮”，但这也不是特朗普宣称的他和民主党的“巨大成功”。

现在，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在包括预算的立法问题上很有可能出现僵局。总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推行强制手段来实现其政治进程，事实上奥巴马总统也这么做过。但是那只会让他偏离正常轨道更远。

民主党可以选择开始开启弹劾程序，像共和党 20 年前对克林顿总统做的一样，但是这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特朗普的重点将转移到赢得 2020 年第二次选举上，我们可以预见到，特朗普会认为所有好事的发生都归功于他，而坏事则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问题。

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是需要解决美国问题。众议院掌控权的变化并不能改变美国关于国际问题的政策，比如中东问题，贸易政策，伊朗问题，俄罗斯问题，以及国际机构的问题。

伊朗在近期内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也是争论的核心。三年前，特朗普反对了核武器的议案，但美国的一些盟国决定支持这一议案，于是特朗普当局决定对这些盟国进行制裁。但是国际上还有另一种声音，希望改变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支付体系，从而改变美国的单边主义。

Amy Pope 在《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分化策略》写道，最近几周的选举中，特朗普总统激起了对于外国人非法穿过美墨边界的恐慌——他连续发表多篇推文，认为当前的移民潮会给美国边界带来恐怖分子和罪犯，尽管证据显示这些移民只是一些绝望的人。

这也与特朗普选举中的政策不谋而合。在 2016 年，特朗普成功地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民心，认为建立高墙是控制非法移民的有效方式，尽管鲜有历史证据表明，边境忧虑以及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心会被隔离墙减轻。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执行了母子分离政策——这使得联邦政府不得不为此付出大量资源，而尚在襁褓的婴孩忍受分离。

今天的局面不太可能走向一个充满意义的移民改革——总统需要为有效的制度提供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寻求更加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两党也不一定有足够的智慧采取这些方案。

Peter Trubowitz 在《今日的特朗普看起来十分寻常》中写道，选民们决定将众议院将还给民主党，这意味着在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的时期内，特朗普必须直面这位久经考验的对手。特朗普和可能在未来几天试着发推特淡化选举的结果，但是昨天对这位总统来说确实是严重的打击。

确实，此刻的他看起来没有太多不同，不过是第四位中期选举中遭遇挫折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在 1994 年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掌控，乔治布什和奥巴马则分别在 2006 年和 2010 年面临这一情况。特朗普也面对着选民们对其政治京城和外交政策的愤怒与失望。

这会迫使特朗普寻求两党合作吗？在一些问题上答案是肯定的，如削减药价、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问题上，尽管合作的深度却决于特朗普是否愿意向民主党妥协，以及众议院是否认为相对于直接立法而言，更好的方式是释放合作信号。

也就是说，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两党合作的阻碍。正如特朗普在 2016 年和 2018 年的选举战略所体现的，他认为选民的两极分化会是他赢得 2020 年选举的最佳筹码。

美国中期选举和全球经济

Bowen Call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美国民主党最近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同时共和党在几十年来最重要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参议院。本文总结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对该新闻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的分析。编译如下：

全世界都对今年美国的中期选举有着浓厚的兴趣。约翰·科奇（John Kotch）认为，除战时外，美国大选结果通常由国内问题决定，但长期会给整个国际形势带来影响。特朗普总统表现出的“美国第一”的态度体现了一种竞争大于合作，美国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的国际氛围。中期选举的结果将表明世界是否确实正在转向民族主义，并将澄清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立场。

我们还没有看到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胜利将如何影响总统的态度。而即将到来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可能会让我们首次窥得这个问题的端倪。在这次会议上，不再像之前一样胆大妄为，而且有些沮丧的特朗普将在贸易政策和关税问题上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计划在另一个峰会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议，讨论半岛无核化问题。科奇强调，这两个事件表现出的势头都很关键，而这一势头最终由选举结果决定。

在投票前，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写道，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至少在几年内会改变美国国内的政治轨迹。历史表明，美国总统在国内的权力受到国会限制时，一般都会转向外交政策。具体而言，当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被在野党掌握时，总统在国外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为他在这一领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通过重大战争之外的小规模干预，有希望取得明确的胜利。

弗兰克·朗菲特（Frank Langfitt）认为，大多数西欧人会对民主党在众议院获胜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样可以遏制特朗普总统的权力。这种兴趣来自于人们对特朗普似乎要背弃跨大西洋联盟、众多西方民主国家和美国传统盟友这一现实的担忧。尽管欧洲大部分官员不喜欢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方针，但也确实有人支持这一主张，特别是以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脱欧者们，特朗普与他们在关于欧盟的一些问题上意见非常相近。此外，与前任总统奥巴马相比，特朗普在与英国自由贸易协议问题上的态度更加热情。许多英国脱欧者认为，目前来看，一个强大的特朗普政府会对他们有利。

然而对中国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对价值约 2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对此进行了报复，提高了共和党执政州出产产品的关税。中国问题学者、南华早报记者阿恩森·欧（Anson Au）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取得成功将意味着特朗普必须采取

较为温和的基调。在他还保有较大权利的地方，特朗普现在必须与其他国家和国内其他利益团体进行谈判。

如奈什卡·钱德兰（Nyshka Chandran）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中期选举不太可能对中美贸易战产生影响。权力的转移很可能在许多方面对特朗普的重大立法提出挑战，包括军费开支和对外商业交易等。然而，总统在贸易政策上享有行政权力，无论国会是否有意见分歧，他都可以制定条款。此外，民主党和共和党通常都被认为支持在对中国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尽管如此，如果特朗普将美国撤出世贸组织或重新对欧盟征收关税，民主党可能会对此进行干预。

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的弗雷德里克·肯佩（Frederick Kempe）写道，美国盟友担心美国民主正在慢慢失去信誉，且美国模式的吸引力正在降低。这一点，再加上中国的崛起，为中国推广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其作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另一个有效选项提供了完美的环境背景。两极分化的美国政治框架在解决核心问题方面的效率越低，越会出现更有吸引力的威权模式，中期选举无疑将对美国在全球政治模式竞争中的竞争力产生影响。

在对选举后市场表现的分析中，弗雷德·伊姆伯特（Fred Imbert）和迈克尔·谢茨（Michael Sheetzets）指出，周三道琼斯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都出现了自 1982 年竞争以来第二天的最大涨幅。在特朗普总统暗示他愿意与民主党合作，采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后，主要均线达到顶峰。

丹尼尔·尚恩（Daniel Shane）和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说，欧洲股市将为选举结果“欢呼”。亚洲市场在小幅涨跌之间波动，投资者看到了各种事件结果，结束了喜忧参半的一天。到欧洲交易开始时，对国会分裂、美国政府很可能不作为的预期已经对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证明，选举结果对投资者来说是良性的；从历史上看，立法僵局对美国股市来说是相对积极的，因为监管的变化普遍具有破坏性。

在国会分裂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监管和货币政策可能会保持不变。兰达尔·詹森（Randall Jensen）和维尔达纳·哈德里克（Vildana Hajric）认为，共和党人将很难做到进一步减税，不过目前的减税政策也不会轻易收回。此外，那些可能推高利率的主要财政举措似乎不太可能实施。然而，过多僵局可能是一件坏事——2011 年债务上限僵局就是一个例子，该僵局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信用评级下降。事实上，尽管 2016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冲击都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美国中期选举还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顺利通过。

本文原题为“US Mid-term Elec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本文作者 Bowen Call 为 Bruegel 的助理研究员实习生。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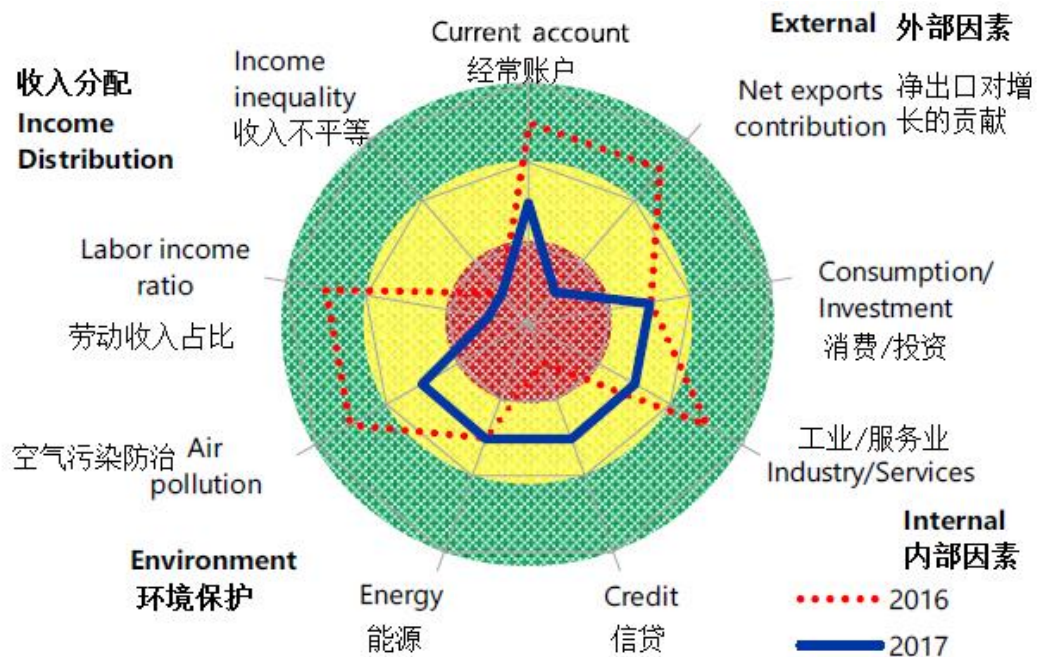
中国的再平衡

Rui C. Mano, Jiayi Zhang/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对于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而言，再平衡问题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笔者从四个角度观察并总结了中国 2017 年在再平衡问题上取得的成绩及遭受的挑战，笔者认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再平衡的步伐在 2017 年显著放缓，但这并不会逆转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进程。编译如下：

中国经济再平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实现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再平衡是他们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2011-2015）就明确列出了再平衡的几条核心要素，包括刺激消费、扩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开放资本账户等。在本文当中，我们从四大维度出发，综合评价中国 2017 年经济再平衡取得的进展。这四个维度分别是：（1）外部因素的维度；（2）内部因素的维度；（3）环境保护的维度；（4）收入分配的维度。

图 1 图解中国 2017 年的经济再平衡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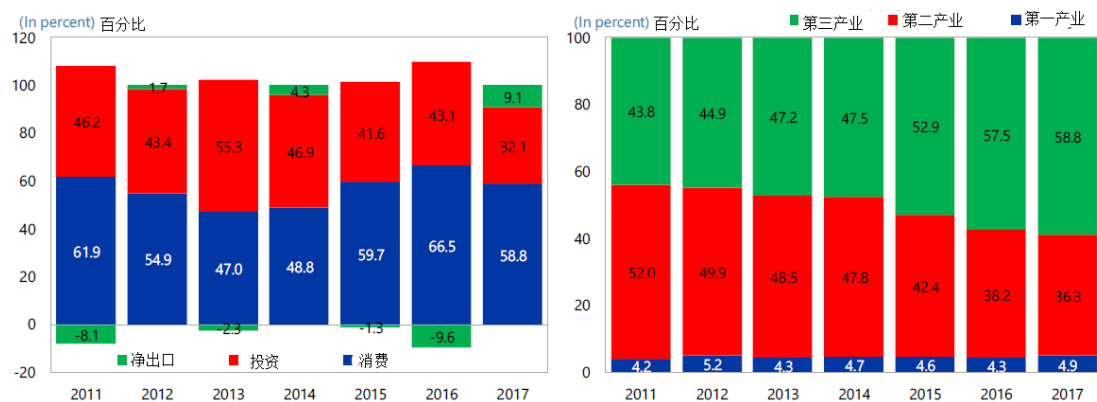
备注：绿色代表“显著进步”、黄色代表“有限进步”、红色代表“退步”

总体来看，2017 年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步伐显著放缓，且在四个维度上取得的成绩不尽相同：在外部因素的收入分配上，2017 年与过去相比是退步的；在内部因素上，中国取得了有限的进步；而在环境保护上，中国则取得了很大成绩（见图 1）。

以下，我们分四个维度分别对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行评估：

从外部因素的维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无疑遭遇了一定挫折。考虑到 2017 年全球经济强劲复苏，外需回暖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澎湃动力。据我们的测算，2017 年外需为中国贡献了 0.6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值。此外，2017 年中国的净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 9.2% 和 6.9%。而相比之下，2016 年这两项数据仅为 0.4% 和 2.5%。但是，由于不利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TOT），2017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进一步下降，目前大约为 GDP 的 1.4%，名义量下降了 250 亿美元左右。我们认为，这背后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原材料价格的迅速上涨。

图 2 各项目在真实 GDP 中的占比：需求侧（左）v. s. 供给侧（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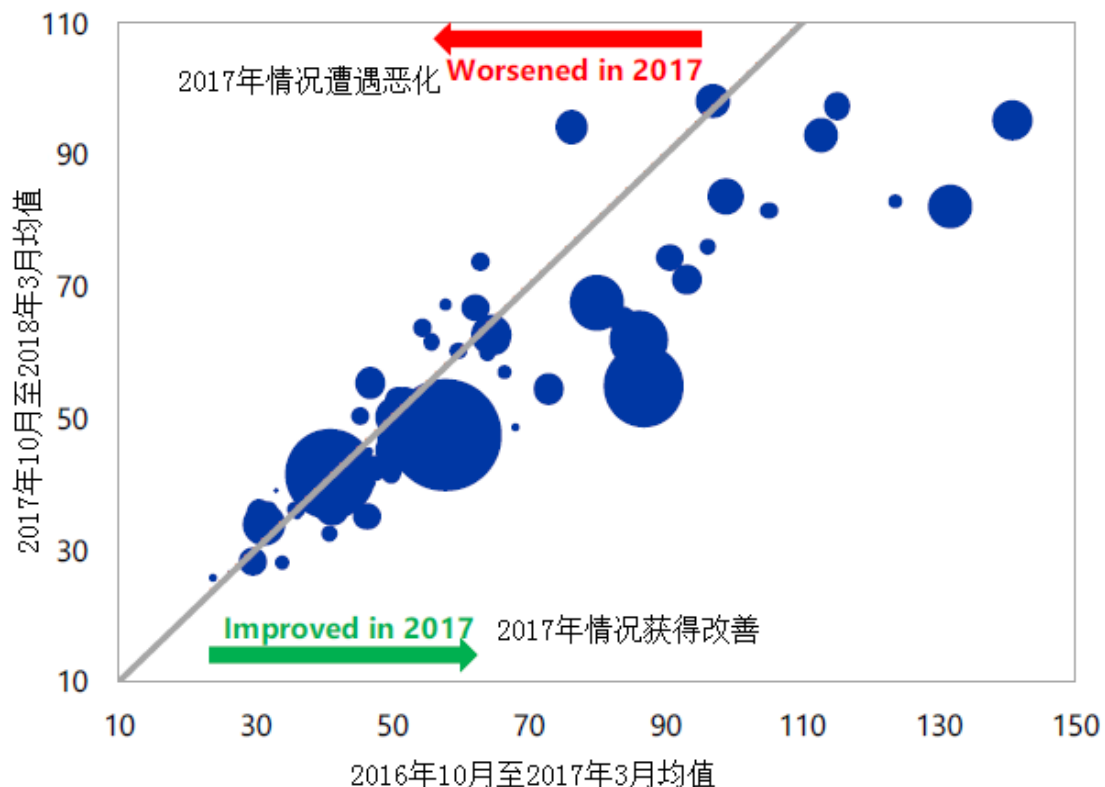


从内部因素的维度来看，中国取得了喜忧参半的成绩。从需求侧来说，地产投资和制造业增长双双显现疲态，这使得投资驱动效应明显放缓。基础设施投资依然起到了定海神针式的作用，在 2017 年中国总固定资产投资（Fixed Asset Investment, FAI）中占 28%。相比之下，在 2011 年，这一数字仅为 23%。而从供给侧来说，服务业（尤其是 IT 行业）明显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可观的动力。尽管房地产行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从 0.5% 下降到了 0.3%，但其他服务业行业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见图 2）尽管如此，从内部因素的维度评估，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还是放缓了，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强力回弹。在 2015 年底之前长达 54 个季度里，中国的 PPI 一直处于下行轨道。但在 2016 至 2017 年间，中国的 PPI 迅速回调，全年上升了大约 6.3%。我们认为，市场需求上升，以及中国在钢铁和煤炭产业去产能的举动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此外，我们认为 PPI 的上行也有助于中国实现去杠杆的目标。

从环境保护的维度来看，中国无疑取得了重大进步。众所周知，自习主席上台以来，“污染防治”被明确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也意味着加强环境保护成为了中国政府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而 2017 年也无疑是中国政府加强环境

保护标志性的一年。在这一年，煤炭消耗占中国总能源消耗比例从 67% 锐减至 60%，此外中国各地政府还通过限行政策，使得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总量减少超过 2000 万辆。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当地政府以极高的效率禁止了传统的燃煤供暖，而是代之以电力和天然气（尽管这一政策在后期经历了一些调整）。此外，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环保督查，从而致力于提高全国的环境保护水平。这些政策对中国城市的冬季空气质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的数据显示，中国 74 个大中型城市冬季的 PM 2.5 水平几乎经历了同步的下降过程，在那些特大型城市尤其如此。但我们也需要指出，尽管这些政策卓有成效，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行政指令性的。如果想长期维持环保政策的效果，中国还应在环保领域引入更多相关的市场机制。举例来说，中国关停高污染行业企业的做法固然减少了污染，但同时也影响了经济增长和当地就业。长期来看，引入类似污染排放税之类的做法或许更有利于实现环保领域的长治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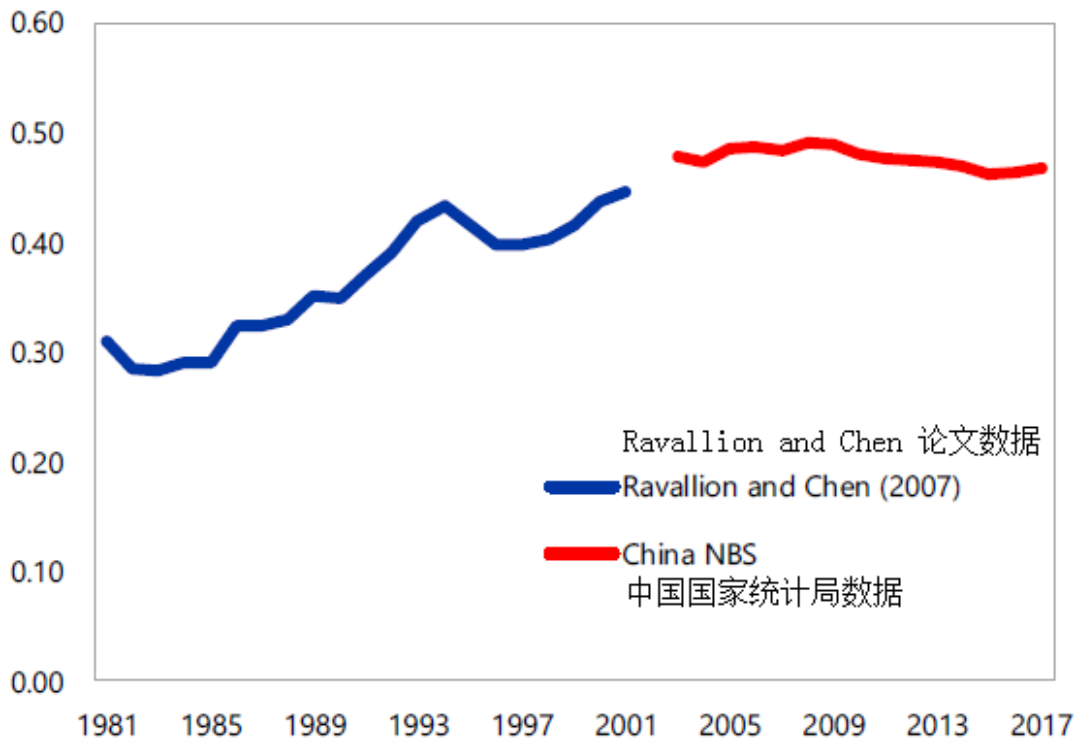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74 个城市 PM 2.5 变化情况（气泡大小代表城市人口）



不过，从收入分配的维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从一些角度来看甚至遭遇了退步。尽管中国政府在扶贫攻坚事业上投入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依然高居不下。在 2017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67，仅略低于 2008 年的历史峰值水平(0.491)。

而中国的城乡收入比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在 2012 年前，这一比值一直逐步下降。但自 2013 年以来，这一比例再次开始缓步上升。此外，劳动收入份额在上升多年后，于 2017 年首次经历小幅下跌。此外，中国省份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中国政府的持续努力。

图 4 中国基尼系数的走势



针对上述四大领域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为了加强外部因素的再平衡，中国政府可以考虑继续扩大开放，将保护性产业向海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并继续降低贸易壁垒，逐步放开汇率管制；

2. 为了促进内部因素的再平衡，中国政府可以减小经济增长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占比、继续改进社会安全网（如扩大社保、医保的覆盖人群）、激励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并刺激消费、减少对服务业的监管力度、强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继续推进金融改革；

3. 为了继续巩固环保领域的再平衡成果，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环保标准，并探索建立一套能为企业提供足够环保激励的市场机制（如设立污染排放税等）；

4. 为了改善收入分配领域的再平衡状况，中国政府可以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关系、通过税收政策促进收入再分配、探索设立财产税，并加强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本文原题为“China’s Rebalancing: Recent Progress, Prospects and Policies”。本文作者 Rui C. Mano 和 Jiayi Zhang 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需警惕一带一路建设的开销

Cecilia Joy-Perez, Derek Scissor/文 张舜栋/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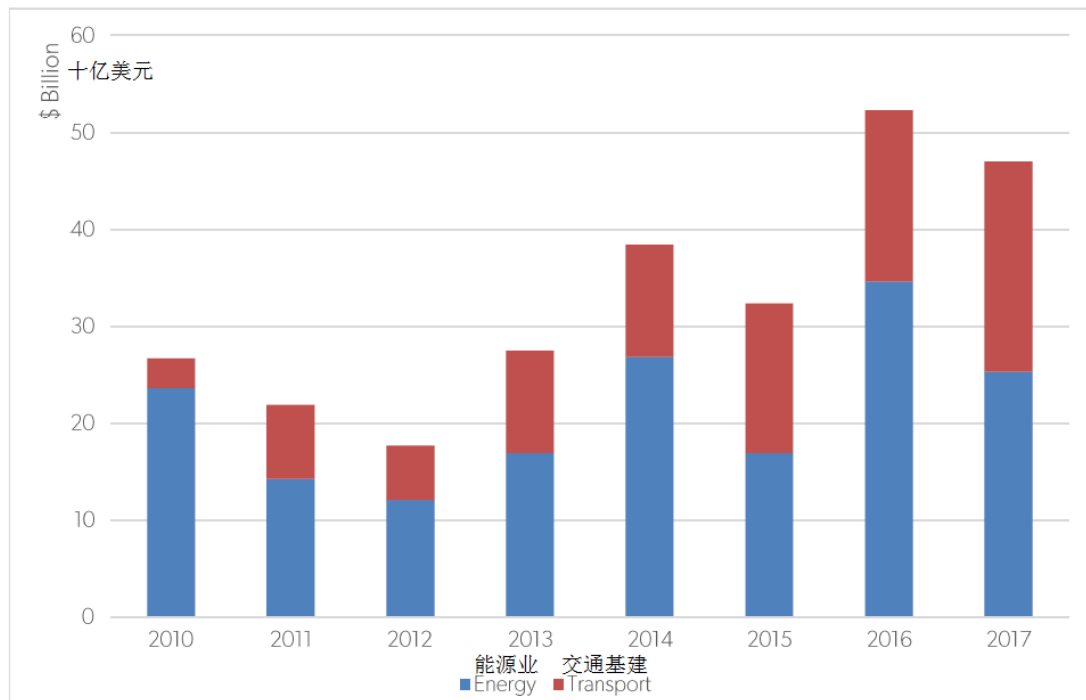
导读：最近半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数量迅猛增长，从先前的 75 个增至如今的 117 个。尽管如此，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和建设规模并没有进一步加速的迹象。作者提出，由于一带一路主要吸引的是国有企业，且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使用外汇储备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因此一带一路的投资前景值得进一步观察。编译如下：

几年前，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推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广义来说，这项倡议也成为了中国大量海外基建项目的品牌工程。自这项倡议被提出以来，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也越来越多。2018 年 6 月，一带一路成员国还只有 75 个。而到了今年 10 月底，该倡议的成员国已经猛增至 117 个，新加入的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不过，尽管成员国数量迅猛增长，但一带一路的投资和建设势头暂时还未见变化。此外，在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国有企业依然是相关建设项目的参与者。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个年头。五年来，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共同运营的中国国际投资追踪数据（Chinese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CGIT）一直密切关注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总额约为 1480 亿美元，而中国承建的工程总价值至少有 2560 亿美元。我们之所以区分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工程建设，是因为投资意味着所有权，而建设则仅代表中资企业对项目所在国出口的工程服务。

工程建设无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所在，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 2014 年之前的四年半里，中国在上述 75 个国家新承建的工程项目总价就已经达到 1570 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中，能源行业占了总价值的 44%。而仅随其后的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总价值的 30% 左右。从分布来看，中国承建的一带一路工程项目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但不同国家的行业分布也有差异。举例来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行业，而在埃及和阿联酋则以地产项目为主。

图1 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在能源和交通基建行业的分布情况：2010-2017



过去一年来，一带一路项目总体的透明度显著下降。如果读者尝试检索就会发现，与过去相比，最近一年中国承建的许多一带一路项目都缺乏在线的英文介绍。举例来说，作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承包商之一，中国水电（Sinohydro）今年在官网上更新的英文信息总量比2015年还要少。我们认为，中资企业这种行为的背后或许存在政治考量。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内兴建了海量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尽管中国的国内需求依然可观，但其内需增长前景显然已大不如前。不过，中国政府并没有相应地削减国企的规模。相反，中国更喜欢选择合并基建行业的国有企业，使之看上去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自然不会以利润为首要目标，他们也不太担心企业破产。如今，这些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来到一个又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在这些国家，基建行业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施工条件差和融资困难大的双重挑战，但对于中国的国企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中资国企在过去积累了大量施工经验，而其本国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融资支持。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就大得多。他们不仅要时刻考虑盈利，而且其面临的资金成本也相对较高。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往往需要承包商在竣工后继续提供一段时间维护服务，而这类服务往往利润空间有限，因此中国私营企业在此类项目的劣势就更加突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带一路的工程总量中，中国的私营企业仅贡献了4%。

表 1 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分布的前 10 大国家：2014-2018 一季度（十亿美元）

Country	国家	Volume 总量
Pakistan	巴基斯坦	31.8
Bangladesh	孟加拉	18.1
Egypt	埃及	17.0
Malaysia	马来西亚	15.3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5.2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	13.4
Laos	老挝	12.6
UAE	阿联酋	12.2
Iran	伊朗	11.3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9.7

在投资领域，中国私营企业取得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截止今年 6 月 30 日，中国的私营企业仅贡献了一带一路总投资的 28%，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缩减。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 年上半年中国私营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投资下滑了 12%。这其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中国华信（CEFC）：这家中国的民营能源企业巨头仅在 2018 年上半年就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上亏损了 109 亿美元，而他们的 CEO 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调查。从大环境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普遍缺乏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且投资风险也相对较高。举例来说，在一带一路国家，“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指投资者从头开始建立厂房设施的投资项目）占到总投资的 50%；而在非一带一路国家，这一数字仅为 12%。也就是说，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往往意味着更长的项目周期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比方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浙江恒逸早在 2014 年就向文莱投资了总价值 34 亿美元的 PMB 石油化工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这一项目还没有投入生产。

表 2 一带一路的中国投资分布情况：2014-2018 一季度（十亿美元）

Country	国家	Volume 总量
Singapore	新加坡	24.3
Malaysia	马来西亚	13.2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	9.9
Israel	以色列	9.8
India	印度	9.0
Indonesia	印尼	8.7
South Korea	韩国	8.1
Pakistan	巴基斯坦	7.6
UAE	阿联酋	5.6
Laos	老挝	4.7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宣布又有 42 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使得一带一路国家的总数上升至 117 个。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在这 117 个国家新增的工程项目总价为 3610 亿美元，而新增投资总量则为 1754 亿美元。在新加入的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贡献了新增工程项目的大头，达到 937 亿美元。尽管总量惊人，但如果我们关注过去十几年的投资走势就会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承建非洲工程项目快速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更像是过去中国输出工程建设和投资的总结与包装，而非无中生有的创造。

不过，尽管成员国数量突然上升，但近年来一带一路方向上中国投资和建设的速度并没有加快。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恐怕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众所周知，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中国的外汇储备来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尽管中国目前还有高达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考虑到 2014 年到 2016 年间外储迅速消耗的历史，以及中美贸易战尚不明朗的前景，中国政府对使用外储的态度显然谨慎了许多，这当然会使得一带一路方向的投资和建设步伐放缓。

最近，美国经常批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诱骗沿线国家掉进其精心准备的债务陷阱，并最终使中国在债务国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客观地讲，中国似乎并没有这么做的理由。诚然，中国近年来在不少沿线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强，但这通常是由于中国是国际上唯一有意向对他们进行投资的国家。因此，投

资和债务本身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多大。华盛顿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斯里兰卡的 Hambantota 港是中国利用债务陷阱诱骗其他国家的明证，但在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类似的项目还有 501 个，而类似的例子却仅有斯里兰卡一个。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委内瑞拉，该国最近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得其许多债务被迫违约，中国在该国也损失了超过 200 亿美元（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投资总量大约是 622 亿美元）。然而，中国依然坚持向委内瑞拉的潜在优质企业（如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PDVSA）提供贷款，以期在未来挽回目前的贷款损失。也就是说，要是真有什么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陷阱，那中国自己往往也深陷其中。

据我们的估计，在未来四年内，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工程项目总价将有望超过 1 万亿美元。但是，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发展迅速，但这并没有根本上加快或改变中国对外投资和输出工程建设服务的趋势。就目前来说，中国对外输出的工程建设总量要大大超过投资总额，国企是其中的主要参与方，而他们主要关注的行业是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最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有任何通过债务陷阱诱骗其他国家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凭借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水平，一带一路倡议恐怕连一年都坚持不了。

本文原题为“Be wary of spending on the Belt and Road”。本文作者 Cecilia Joy-Perez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政治经济学方向研究员；Derek Scissors 是 AEI 常驻研究员、中国国际投资追踪数据（Chinese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CGIT）项目负责人。本文于 2018 年 11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简介：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于1943年创立，原名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1962年改为现名。到70年代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包括政治、经济、外交、防务、能源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大量出版、发行其研究成果，广泛宣传其主张，陆续与三百所大学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周举办“公共政策论坛”电视节目，在全国四百个电视台播放，竭力扩大其影响。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

网址：<http://www.aei.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家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简介：该机构建于1962年。创始人是前海军作战部部长阿勒·伯克海军上校、尼克松政府助理国务卿戴维·阿布希尔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查德·艾伦。该中心以维护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强硬路线为宗旨，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之称。主要研究政治与军事、国际资源、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问题。现有研究员人员200多人。在《2017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7）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

网址：<http://www.cato.org/>